

高力士与唐玄宗关系探微

崔荣华¹, 陆丽丹²

(1. 南通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00 2. 南通高等师范学校, 江苏 南通 226100)

摘要:唐代宦官政策从抑制到扶持的改变为唐朝宦官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宦官高力士因多次协助李隆基政变而以功臣的身份登上唐代的政治舞台,并以自己的忠诚不渝、办事谨密、善理朝政而成为唐玄宗的代言人。唐玄宗因功宠奴、因势信奴、因情宠奴,视高力士为心腹总管,从而成就了大唐历史上君臣和睦相处、患难与共的一段佳话。

关键词:高力士;唐玄宗;宦官

中图分类号:K2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34(2007)03-0106-04

宦官作为君主专制时代的附属物而与最高统治者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联系随时代的更替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一般说来,历代的宦官不仅仅是君主的家奴,同时还具有国家官员的身份,依附在权利之巅而又身具二重身份的宦官,尤其是那些高级宦官,不可避免地历代君主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误国,被视为邪恶小人、罪魁祸首的并不在少数,身居高职、握有大权却又忠心侍主而不弄权的并不多见,唐玄宗时期的高力士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一、初唐至中唐时期的宦官政策及其变化

唐初统治者对宦官采取的是防范和裁抑政策,这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十分注意“以亡隋为戒”,注意吸取历代王朝衰亡的经验教训,对宦官预政的危害有较为清醒地认识。名臣魏征曾多次告诫太宗:“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1]子承乾被太宗废黜,其重要的过失之一即他“宠昵宦官”。高宗李治时期,司农少卿韦机在苑中见到宦官犯法,即“杖而后奏”,高宗闻知后特赏绢数十匹,并言:“更有问者,卿即鞭之,不烦奏也。”^[2]初唐时期良好的君臣关系和上下畅通的社会氛围有效地扼止了宦官势力的扩张。当时唐朝的宦官,人数不多,权势不高,范围不广,据《旧唐书·宦官传》序文记载:“贞观中,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

内侍是长官,阶四品。至(高宗)永淳末,向七十年,权未假于宦官,但在内门守御、黄衣廩食而已。”^[2]由此可见,唐初在防止宦官窃权方面的措施是颇为得当的。

高宗末年,武则天专权,唐代宦官势力有所抬头。武则天宠信如薛怀义、张昌宗之流,可以说开唐朝内官用事之先声。武则天之后,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等后妃公主皆曾先后擅政专权,因而出现了“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3]的局面。宫廷内乱的频频发生,为宦官干政提供了新的机遇。宫变之中,宦官多预其事;宫变之后,宦官常常因功升迁,大宦官薛思、高力士莫不皆然。唐中宗时能够进入品官等级的宦官,已经数以千计,《新唐书》载:“到中宗,黄衣乃二千员,七品以上员外置千员,然衣朱紫者尚少。”^[3]此时的宦官虽未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但人数的猛增,则预示着宦官地位和权势的上升,而唐初所制定的一些限制性条款,如宦官不得养子、任职最高不超过四品等等均已遭到破坏。

司马光曰:“宦官之祸,始于明皇。”^[4]玄宗时期,乃是唐朝宦官势力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开元初期,虽然玄宗采纳了“救时之相”姚崇的“愿宦竖不与政”的建议,严禁朝臣结交宦官,使宦官势力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由于封建专制政治本身的局限及唐玄宗“渐怠于政事”,寄身封建机体上的宦官乘机发展,不断地扩大自己势力,至天宝年间,“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衣朱紫者千

收稿日期:2006-07-03

作者简介:崔荣华(1962-),男,江苏南通人,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文化史研究;陆丽丹(1971-),女,江苏南通海门人,南通高等师范学校教师。

余人^{③[3]5856}。玄宗以中官高力士、袁思艺承恩遇，特置“内侍监两员，秩三品，以授之”^{④[2]4758}，彻底打破了唐初规定的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的限制。以高力士为代表，唐代宦官开始直接干政，当然高力士并不是唯一受玄宗垂青的宦官。玄宗对其宠信的宦官常常委以重任，“中官稍称旨，即授三品将军”，此外“殿头供奉、监军、入蕃、教坊、功德主当，皆为委任之务”^{⑤[2]4757}。玄宗一手培植扶持了大批宦官，并不断地提升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

在政治上，玄宗允许并授权于宦官来干预朝廷行政、军务。除高力士深得玄宗信赖外，其他宦官也开始干预军事。据《旧唐书》记载，宦官杨思勳曾多次奉诏带兵征伐安南、五溪等地的叛乱，“以军功累加辅国大将军，后从东封，又加骠骑大将军，封虢国公”^{⑥[2]4756}。此外，由于玄宗时设置九节度使，边塞重兵长期由节度使控制，为防止权限过大，便派宦官前去监军。玄宗天宝六年，宦官边令诚监高仙芝军出讨小勃律，宦官监军始于此，不过当时还只是打仗时由朝廷派遣的随军监察，仅在军事上对统兵将领起一定的牵制作用。此后，宦官监军才逐渐制度化，职权也不断扩大，“监军则权过节度，出使则列郡辟易”^{⑦[2]4757}，与方镇节度使分庭抗礼，名正言顺地参预一切军、政事务的管理。

在经济上，由于玄宗的恩宠，不少宦官被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所以他们的实际俸禄要比其担任内侍省职事官高得多，而且每到地方出使，所冀皆为千万计。唐朝的爵制分为九等，用于封授功臣，除重臣武将得以封爵外，宦官亦可以封授。自开元以来，随宦官势力的膨胀，封爵者便多起来，如高力士便得到过齐国公的爵位，杨思勳被封为虢国公。权势与财富并进，宦官的经济地位也逐渐上升，那时“帝城中甲第，畿甸上田、果园池沼，中官参半于其间”^{⑧[2]4757}。

正是在皇权的一步步扶持和利用下，宦官在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形成一股势力，逐渐登上了当时的历史舞台。唐玄宗为何在其统治的中后期一改唐初对宦官的抑制政策，而大量地培植任用这些宦官亲信呢？专制权力下的皇帝们心理都明白，宦官的存在不仅是为了防止后宫女子失去贞洁，主要是他们自己需要宦官。他们大多确信，那些日夜陪伴于自己身边的宦官才是最值得信赖的人。相比较而言，百官、后妃、外戚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奴仆，宦官才是真正的奴仆。皇帝与百官之间，虽有君臣等级名份，但大臣们有着自己的是非观念和职责权限，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对君王提出劝谏，甚至据理力争。宦官则不然，他们只能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处处察颜观色、小心办事。唐玄宗曾亲眼目睹宫廷斗争的千变万化，并亲身经历过宫廷政变，他对功臣、后妃、外戚有着某种自然的防范心理。他之所以如此器重宦官，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在他初登大位之时，虽然岐王、薛王、兵部尚书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等人皆

立有大功，但玄宗对于这些功臣却总是耿耿于怀。《新唐书》记载：王毛仲得宠之后，“求为兵部尚书，帝不悦，毛仲怏怏，乃与葛福顺为姻家，而守德及左监门将军卢龙子唐文地、左右威卫将军王景耀高广济数十人与毛仲相倚为奸。”^{⑨[3]4336}玄宗见其势渐大，且志满而骄，顿觉不安，所以利用种种借口把他们相继排除。对于后妃，玄宗也吸取了此前皇后摄政的教训，在废除王皇后之后就未肯立皇后，不让所宠爱的武惠妃、杨贵妃凭借皇后名义来插手政治。对外朝和后宫的不信任促使玄宗挑选身边得力能干的宦官协助他处理政务成了必然之举，整个参与玄宗进行夺权的功臣中，只保留了宦官高力士、杨思勳等人的地位，且不断地加官进爵，视为心腹。《后汉书》作者范曄认为，宦官体非全气，所以情志专良，看来唐玄宗也是相信这一点的。当然，宦官不仅仅是皇帝在宫内的得力助手，同时还是皇帝用来牵制外朝大臣权力的一个法码。唐玄宗在设置九节度使后派宦官们去监军，充当监军的宦官未必都懂军事，但在代表中央加强对节度使控制这点上总还是起了些积极作用的。监军出现的目的就是借助宦官势力来钳制边疆大臣的手脚，以达到权力的平衡。因此，宦官在其中只不过是充当了皇帝爪牙的角色而已。

二、高力士屡建大功，忠心侍主，上报皇恩

皇帝需要宦官，宦官则更需要皇帝，宦官之所以成为一种制度，它完全是专制皇权的需要并由之而决定的。因此，一般情况下宦官始终是专制皇权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他们以皇帝为主子，并把自己的命运同皇帝的命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皇宫中一时不可或缺的成员。高力士便是一个把自己的命运与唐玄宗的政治生命紧密相连的著名宦官。

高力士（684—762），原名冯元一，广东潘州人。其父冯君衡为潘州刺史，是唐初上柱国、高州总管冯盎的孙子，“家雄万石之荣，囊有千金之值”。武则天长寿二年，监察御史万国俊到广州诬告岭南流人谋反，残杀几千，冯君衡也“因以矫诬罪成，裂冠毁冕，籍没其家”，时满十岁的高力士被强制与母分离，锁拿为奴以受阉割之刑。“圣历初，岭南讨击使李千里上二阉儿”，高力士便是其中之一儿，并改冯元一为力士，与金刚相对，送入宫中以讨信佛的武则天欢心。高力士进宫后，因为“强悟”、“黠惠”，受武则天喜欢而跟随左右，后因犯有小过，被鞭笞出宫。宦官高延福收其为义子，故冒高姓。身为官阀兼内谒者监的高延福本出自武三思之家，所以高力士遂往来于武三思家。一年多后，由于武三思的周旋，高力士被武则天“复召入禁中，隶司宫台，廩食之”^{⑩[2]4757}。

在深宫中成长的高力士，因性谨密灵敏，善于传宣诏令，大小事务触机应旋，颇得武则天器重，授宫闱丞，管理后妃居住。公元705年，武则天死后，中宗复位，操纵实权的韦后把持朝政，组织自己的韦氏家族，勾结武氏宗族，先

后除掉了太子李重俊和唐中宗李显,欲步武则天之后窃国临朝称帝。时任潞州别驾的临淄王李隆基深知韦、武用事,必为国家大患,故在藩邸常阴聚才勇之士。而此时身居宫中的高力士眼见韦后弑君篡权,妄图倾覆唐王室而心怀忧虑,所以宫廷之变伊始,他便坚定地站在临淄王李隆基一边,“倾心奉之,接以恩顾”^{[2] 4757},全力支持李隆基。这一行为显示出高力士具有一定的政治见识,正是由于他的慧眼识主,使得他能在后来的仕途上平步青云。李隆基此时也渴望如此人才籍为内应,因此把他引为知己,谋求匡复社稷。景龙四年,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利用禁军先发制人,铲除了韦后及大批武氏党羽,恢复睿宗帝位,自己也被立为皇太子。宦官本来是皇帝的家奴,地位并不高,但高力士在这次政变中积极配合并直接参与其中,故平乱之后,“奏力士属内坊,……擢授朝散大夫、内给事”^{[2]4757},从此高力士便侍俸于李隆基的左右,为他进一步渗透到李唐高层统治打下良好的基础。

昏懦的睿宗在位两年间,太平公主自恃拥立有功,趁机扩大势力,“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大半附之”^{[4]6681}。玄宗即位后,太平公主与一些朝臣联合禁军首领准备密谋废立。危急之下玄宗与龙武将军王毛仲、内给事高力士等十几个亲信决定先下手为强,即刻诛灭公主党与数十人,粉碎了太平公主的叛逆,从而结束了宫内多年纷扰动荡的局面。高力士身先士卒又立大功,被玄宗提升为正三品,右监门卫将军,监督皇室门卫,进封为知内侍省事,成为管理宦官的总头子。高力士正是在这一系列短兵相接的权力斗争中显现出了他的勇敢和效忠,因而倍受玄宗信任擢用,以功臣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

从玄宗 710 年被立为太子始,直到 762 年玄宗驾崩,高力士五十余年都在玄宗身边小心恭侍。虽然他“恩遇特崇,公卿宰臣,因以决事”,但他“性和谨少过,善观时俯仰,不敢骄横,故天子终亲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恶也”^{[4]6890}。可见他仍保持着一个传统宦官的本色,不像李辅国以后的宦官那样架空皇帝、专权跋扈,甚至随意废立皇帝,高力士则一直恪守着“事君之忠”的信条,至始至终维护着玄宗的权力和地位。

开元初,“救时之相”姚崇曾面奏请序进郎吏事宜,虽言之再三,玄宗始终未予理会,姚崇畏惧而退。事后高力士进谏:“陛下新即位,宜与大臣裁可否,令崇亟言,陛下不应,非虚怀纳谏者”。玄宗解释说国家大事由他决策,象郎吏任用这样的小事姚崇自可作主,不必前来烦我。高力士马上转告“悸不自安”的姚崇,使其放心地改进吏治,“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3]4383}。高力士以其特殊的身份起着沟通作用,使朝廷上下君臣之间的关系更趋和谐,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玄宗的地位。

然而进入天宝年间后,玄宗自恃升平,渐图安逸。而此时位于肘腋的高力士仍是忠心耿耿,对玄宗的所作所为也决非是“有言必从,有可必纳”,相反地还向玄宗申述

过自己在一些问题上的不同见解。天宝三年,玄宗对高力士说:“我不出长安且十年,海内无事,朕将吐纳导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高力士坦言相告:“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权既振,孰能议者!”^{[3] 5859}暗示玄宗要提防外朝大臣权力的膨胀,再次遏止了奸臣李林甫权力的不断扩张。

安史之乱前,高力士已觉察到朝政的危机,大胆地向玄宗进谏:臣“见奏事者言云南数丧师,又北兵悍且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高力士已看出边将手握重兵将不利于唐朝中央政府,节度使安禄山拥兵河北范阳,大有反叛之意,只可惜玄宗对安禄山的险恶用心视而不见,敷衍道:“卿勿言,朕将图之。”^{[3]5860}但实际上玄宗却未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叛乱。高力士作为一名宦官,如此告奉玄宗,不仅表露了他的丹心可鉴,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他对时局变迁的高度洞察力。

安史之乱即将结束,玄宗从成都回至长安,李辅国因拥立肃宗即位而取得权势,所以他时刻担忧玄宗回到长安将威胁肃宗的地位,为削弱玄宗的势力,他迫使玄宗迁居太极宫,玄宗就此过上了囚徒般的软禁生活,而此时陪伴他左右与之共患难的只有高力士。高力士明知自身处境的艰难,却为了维护唐玄宗的地位,依然挺身而出反对李辅国干政,终被李辅国强加罪名,放逐巫州。

三、唐玄宗因功用奴,因势信奴,因情宠奴

唐玄宗时纵容宦官,“尊重宫闱”,宫中宦官数量增加,权力也超越过去,然地位之重要都不及高力士。高力士本出身籍没家庭,地位非常低下。但由于他参与了玄宗的两次政变,“公(高力士)实勇进,飞龙在天,扶皇运之中兴,佐大人之利见”^[5],所以玄宗才因功擢用:开元初便授高力士为右监门卫将军(正三品),知内侍省事;天宝初,增授高力士为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天宝七载,加封他为骠骑大将军;天宝十四载,置内侍省,任高力士为内侍监,佚正三品,由此把高力士从一名普通的宫廷奴仆提拔成自己的宠臣、亲信。高力士在宦官中已是权大位尊之人了,“中人若黎敬仁、林昭隐、尹凤翔、韩庄、牛仙童、刘奉廷、王承恩、张道斌、李大宜、朱光辉、郭全、边令诚等,并内供奉,或外监节度军,修功德,市鸟兽,皆为之使,使还,所哀获,动巨万计,京师甲第池园、良田美产,占者什六,宠与力士略等,然悉藉力士左右轻重乃能然”^{[3]5858}。在宫中,玄宗不称其名而称将军,“肃宗在春宫,呼为儿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2]4758}。

随着高力士地位的提高,玄宗已经把他视为须臾不可离开的人物了,大小事务都需要听取一下高力士的意见。开元二十四年,李林甫为了排挤张九龄,推荐“与时沈浮、唯唯恭愿”的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强谏不可,于是玄宗询问高力士的意见,高力士支持良相张九龄,回答说:“仙客本胥吏,非宰相器。”但玄宗忌讳说他用人不当,坚持罢了张九龄的官职,后在天宝十五年逃往四川的途中曾表示

后悔没有听取高力士的劝谏。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太子瑛被废之后,武惠妃得宠,李林甫等人欲立武惠妃子寿王,而玄宗以李享年长而犹豫不决,寝食难安,高力士及时进言:“推长而立,孰敢争?”帝曰:“尔言是也。”^{[13]5860}正因为玄宗果断地采纳了高力士的意见,储位问题才得以顺利解决,从而避免了又一场宫廷斗争。

玄宗因为高力士办事谨密慎微,自己又怠于政事,于是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玄宗常曰:“力士当上,我寝则稳。”^{[12]4757}常止于宫中,稀出外宅,把大小政务都托付于高力士去操办,防范之心荡然无存,由此可见,高力士的倍受宠信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此时的高力士俨然成为唐玄宗权力的化身,已能代表玄宗驾临朝野,朝中大臣如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虽以才进,然皆厚结力士,故能踵至将相,其余承风附会者不可计数。甚至哥舒翰与安禄山、安思顺素有恩怨,矛盾极深,玄宗也命高力士设宴邀请双方,为其和解,虽然未达目的,但由于高力士的暗示,哥舒翰对安禄山的怒骂未做回击,才使矛盾没有进一步激化。

唐玄宗晚年颇为凄凉,被迫从兴庆宫迁往太极宫,名义上为太上皇,实则被变相软禁,但由此他与高力士的关系则更进了一步。虽然玄宗的膳食中不再有肉,但这对年老的主仆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共同打发着黄昏时光,名义上他们还是君臣,实际上已是伙伴。每天或在庭院漫步,修剪些草木花枝;或者闲居一室,谈论经义文章;或说些有趣的话儿,感叹一番人世的沧桑,俨然一对推心至腹的老朋友。而这样开心的日子并没有延续多长,不久之后,高力士患上了疟疾,生怕传染给玄宗,就移居到功臣阁下,哪知从此一别,天涯各一方,君臣之间竟成永别。

概言之,高力士最初协助玄宗取得了皇位,继而又支持玄宗巩固了政权,最终也伴随玄宗失去了权力。玄宗由一个大有作为、积极进取的皇帝,转变为怠于政事、骄奢淫逸的皇帝,而高力士对玄宗则始终是忠心耿耿的。这种忠心已不仅仅限于一个家奴对主子,一个臣子对君主的角度,其对唐玄宗的个人感情也是极为诚至而深厚的。他在被流放巫州前曾力求再见太上皇一面:“臣当死已久,天子哀怜至今日,愿一见陛下颜色,死不恨。”^{[13]5860}然而

造化弄人,高力士终未能与玄宗见上一面,就怆然上路了。宝应元年(762年)肃宗临终前几个月,诏命所有的流放者赦免回京,高力士回京途中听说玄宗、肃宗先后逝世,情不自胜,悲由心生,一路哭泣不已,“北望号恸,呕血而卒”^{[2]4759},病死于朗州开元寺西院。后来代宗李豫以其老宿,追念他侍奉玄宗有功,赠扬州大都,陪葬泰陵,并在唐大历十三年(公元777年)立碑表彰,这实是对高力士忠心侍奉玄宗、维护唐皇朝功绩的肯定。

唐朝的宦官与皇帝同属于一个利益相关的“家庭”,二者之间是一种主仆关系,主子需要奴才为己服务,奴才则依赖于主子的培植扶持,二者相辅相成。两次政变后高力士因功被擢用,由此他从一名普通的宦官一跃成为唐玄宗的得力助手,他和玄宗的关系也从玄宗在藩时的一般主仆关系转变为君臣关系。玄宗在其统治的中后期渐渐地懈于政务,加上对高力士的宠信,把政事全权托付于高力士,某种意义上高力士已经成为他的权力替身。高力士虽然身处高位,大权在握,但他并没有放纵私欲,玩弄权柄,而是忠心耿耿,倾力护主,以报答皇上对他的知遇之恩和极度之宠信。《高力士神道碑》给了他这样的评价:“中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骄。顺而不谀,谏而不犯。王言而有度,持国柄而无权。近无闲言,远无横议。君子曰:此所谓事君之美也。”^[15]就权宦与皇帝的关系而言,奴仆只有依靠主人的提拔,地位才会不断地提高,而权高位重的宦官又有几个能真正地皇帝患难与共。纵观高力士一生,无论其自身地位如何的改变,亦不论玄宗的地位如何变化,他始终无怨无悔,追随左右,其忠诚不渝的品德亦足为后人敬重。作为一名宦官,虽然他无法与历史上的名臣贤相一样流芳万古,但其“生平无显大过”,身居高职而不失持正,当不愧为宦官中之贤者。

参考文献:

- [1]温大雅.贞观政要[M].北京:中华书局,1975:169.
- [2]刘.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5]魏光.唐高力士碑的几个有关问题[J].考古与文物,1983(2).

责任编辑 文方